

目 录

回忆贵州地下党·····	秦天真 (1)
创业艰难百战多——访邓止戈同志·····	洪 波 (17)
回忆地下党贵阳县工委的一些活动·····	谢凡生 (21)
忆“学联”和“二·一九”事件·····	饶元祚 (26)
营救“二·一九”被捕同学的请愿游行·····	朱立彬 (38)
一九三八年在贵阳·····	黄慧珠 (43)
回忆“民先”贵阳队的活动·····	黄世琮 (72)
贵阳中学地下党员活动片断——访罗明同志·····	章正中 (79)
省立贵阳女子中学学运简况·····	贵阳二中校史编写组 (85)
四十年代初投入革命斗争的片断回忆·····	蔡之诚 (94)
水流长江归大海——忆贵阳“民主社会革命社” ·····	蔡之诚 兰华富 唐树本 (99)
记解放战争时期贵阳一批革命青年的成长和斗争 ·····	绿 叶 (104)
花溪歼匪记·····	李连修 (109)
怀念林青同志·····	李仲梁 (113)
狱中二十日见闻——怀念林青烈士·····	钟大亨 (119)

林青同志遗体是怎样安葬的·····	高言志 (121)
我所知道的共产党员黄大陆·····	孙家骧 (128)
山城奠英烈 风雨忆同舟——缅怀李策同志·····	丁 毅 (132)
忆李策同志·····	黄淑莹 (144)
回忆陈光型烈士战斗的一生·····	彭国华 (151)
怀念张凤鸣、宋治平烈士·····	黄先和 (161)
张凤鸣烈士史迹简介·····	张敏仪 (167)
王启霖、刘家祥烈士在新四军中·····	尹克恂 (174)
金芳云烈士传略·····	曹志文整理 (179)
顾希均烈士在狱中·····	陈梧山 (190)
怀念我的姑姑杜蓉烈士·····	杜楚材 (195)
编 后·····	(200)

回忆贵州地下党

秦天真

贵州地下党从一九三四年初创建起，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贵州解放的十六年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遵照党中央制定的白区工作的方针、路线和战略部署，坚持深入群众，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统治，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前仆后继的斗争，为党为革命和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二十年代末，贵州仍为旧军阀盘踞，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有志革命的一些先驱，早年先后出省活动。周西成主黔，虽搞了点建设，但目的在于对付各派军阀，加强统治。周西成在军阀混战中败死后，毛光翔继起掌权，鉴于周西成专横暴戾，禁锢思想，乃失败原因之一，而稍微放松了些。这样，新思想才得以有所传播。新友、协同、东亚书店相继开设；被周西成查封的达德学校、中华书局得以恢复；早年出省参加革命的同志这时寄来和带回的进步书刊较多。大革命失败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血腥大屠杀，在爱国人士

和进步青年中引起震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在追求进步的人们中间，产生了反响。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的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怒潮。它冲破万山屏障，唤醒了还在军阀统治下的贵州人民。

在省会贵阳，我和一批爱国青年学生发起组织“学生抗日救国团”，上街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主办发行《救国旬刊》（由贵阳高中学生丁树奇主编）。广泛宣传抗日反蒋，揭露蒋介石的卖国投降阴谋；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口号。影响逐渐扩大，许多爱国教师、店员、职员、手工业工人，同青年学生一起，卷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省内各城镇的抗日民众运动也相继兴起。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威，震慑了贵州的反动统治者。他们力图通过破坏学生运动，扑灭燃烧起来的民众抗日怒火，受命于他们的少数学生，出面宣传蒋介石那套“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卖国政策，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性质，否认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他们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救国旬刊》。但是，邪不胜正，他们的反宣传活动，遭到爱国师生的痛击。教育界著名教师田君亮、刘方岳、朱穆伯、李淑元等痛感民族危亡，奔走声援抗日救亡运动，在他们的影响下，学生内部的阵线更加清楚了，那一小批宣传国民党反动谬论的小丑陷入非常孤立的地位。

一九三二年，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商界人士中顺应协力的也不少。贵阳有两家商号，自恃与军警素有勾结，隐匿日货，抗拒验查，竟出手殴打学生，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我们组织群众集队游行，冲入商号，捣毁店

铺，随即包围省府，要求当局惩治奸商，查办军警。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慑于群众的抗日声威，被迫出面公开道歉，立即下令没收奸商资产，撤职查办宪兵营长。

一九三三年，伪教育厅宣布贵阳各学校举行会考，企图转移学生的注意力，破坏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又发动和组织了反会考斗争，质问教育厅长，揭露会考阴谋，又一次迫使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宣布取消了会考。

抗日救亡运动在贵州日益深入，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书刊、文艺作品在进步青年中秘密地广泛流传，争相阅读；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的胜利，在一些进步人士中普遍传颂。革命理论同革命群众运动的结合，为贵州地下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九三三年初，我离贵阳赴黔东北、湘西一带寻找红军，途中受阻，返经贵阳去家乡毕节活动。毕节是贵州西北一个县城，与川、滇两省接壤，地处所谓“一步踏三省”的边界。地方军阀连年混战，相互削弱，客观上有利于革命活动的开展。“九·一八”事变后，这里的民众抗日活动日渐发展。我利用在毕节中学任教的有利条件，进一步组织爱国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在进步师生中，组织关于十月革命和苏联文学的秘密讨论研究，逐渐形成了民众运动的中坚力量。同年秋冬之交，早期被迫离乡，辗转重庆、上海等地，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林青和缪正元，一起返回毕节。他们很快就同我联系，投入这里蓬勃兴起的抗日民众运动。林青、缪正元的到来，是贵州建党的直接条件。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毕节由林青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和缪正元组成了贵州地下党的第一个支部——毕节党支部。在这个支部的领导下，以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徐健生、

宁起坤、宁起加、熊蕴竹、王树艺、孙师武等为骨干，成立了“草原艺术研究社”。通过文艺研究、演剧、歌咏、绘画等活动方式，在进步青年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发动群众，推动抗日民众运动的发展。

“草原艺术研究社”这种公开的群众组织，培养了党的骨干分子，发展了进步力量，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时，我们还积极开展武装工作。当地有一个脱离军阀部队的连长范建章，为人爽直，看不惯军阀统治，以“上等之人挣我钱，中等之人英照闲，下等之人跟我去，每人每月块半钱”为动员口号，聚集力量，在黔西、大定、毕节一带活动，很得这一带劳动人民的好评。我同他接触后，向他宣传革命道理，他欣然赞同，表示愿意一道革命。后来，毕节党支部通过范建章在靠近云南镇雄地区一带秘密开展武装工作。当地的军阀、土豪劣绅十分惊恐。

不久，毕节发生驻军军官调戏一女学生，学校反将被调戏的学生开除，以致逼死人命的事件，激起公愤。毕节党支部组织力量，抗议交涉，发动了广泛的社会声援，揭露了反动当局的可耻行径。反动当局恼羞成怒，妄图以镇压手段平息民怨，并趁机打击进步力量，破坏抗日民众运动。我们获悉反动当局的镇压计划，为保存力量，隐蔽精干，党支部的三个党员和三个进步青年立即转移，“草原艺术研究社”停止公开聚会，转入分散活动。这次事件后，由于我们分散转移到外地，促成了党的组织在各地相继建立和发展。

一九三四年七月，我和林青等从毕节到了安顺，同早在这里组织抗日民众运动的谢速航、陈汉民等取得联系。以后，又到贵阳把原来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已建立的进步关系高言志等组织起来。八、九两月，先后发展徐健生、李策、孟昭仁等入

党。随后又在贵阳一中、高中、女师、达德等校开展建党工作，相继建立了党的支部。同时，党所领导的在群众中具有秘密性质的读书会、文学艺术研究社、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组织也很快建立起来。这时共产党员邓止戈、黄大陆由四川来黔活动，同贵州地下党的支部取得了联系。一些有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进步人士如尹素坚、刘方岳、严金秋等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都有较大发展的情况下，为防止暴露党的组织和力量，一九三四年九月，在贵阳由林青、秦天真、缪正元和邓止戈商定吸收高言志、王石安、肖世铨等人参加开会，分析贵州形势和部署工作。这一段时间，党的工作重点继续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抗日民众运动，同时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谨慎发展党的组织。为此，许多同志被派到各地工作。

同年十一月，刘茂隆同志（即刘雪苇）由上海返黔活动，我同他交谈了关于进一步开展贵州的革命工作，整顿党的外围组织的意见。这时，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由于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反革命围剿均归失败，正集中一切力量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无力他顾于贵州。及至十月，中央红军主力退出江西苏区，长征西进以后，贵州军阀又忙于应付蒋介石推出地方军阀部队，正面阻击红军以保存其嫡系力量的诡计，使我们争取了一段有利时机，发展了革命的力量。

二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红军攻克黎平，进入贵州，连夺剑河、镇远、余庆、黄平、瓮安等县，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三日，强渡乌江天险之后，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林青同

在遵义同党中央取得联系，向党中央负责地方工作的领导同志罗迈（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经中央批准，建立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确定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三人组成，林青任省工委书记。

一九三四年，由四川梁山来的地下党员周司和在遵义省立三中、女中和在社会上活动，组成了“反日反帝大同盟”，参加的有李小侠、何恩余、谢树中、罗红等。红军长征到遵义，即改名为“红军之友社”。红军离开遵义时，“红军之友社”的部分成员参加了红军。红军由云南扎西回师贵州，二渡赤水，大战娄山关，再占遵义后，红军派政委王友发、队长周凤山率领数十名红军干部和战士，会同原“红军之友社”参军的部分人员，组成黔北游击队，转战遵义、湄潭、绥阳一带，几经苦战，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政委王友发和一些同志先后在战斗中牺牲，有的如谢树中等突围后，与杨天源、陈光型等开辟遵义、湄潭一带党的工作。

毛泽东同志在红军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在贵州迂回转战，足迹遍于二十余县，影响深入人心。这正是贵州省工委建立以后，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壮大进步力量的极为深厚的基础。此间，我代表省工委赴安顺召集主办进步刊物《晓鸡声》的骨干和“三一读书会”的一部分成员，举办训练班，主要讨论形势，学习革命理论，建立革命群众组织，发展党的组织，确定谢速航为中共安顺县工委书记，尤树黔为组织委员，陈汉民为宣传委员，同时积极进行武装工作。

红军入黔之前，安顺驻军是军阀犹国材部队。红军离黔后，犹部被国民党改编，辖二个师。其中一〇三师参谋长是我党党员黄大陆，通过他，派进邓止戈任参谋，缪正元、邹凤逸和

王树艺到军电台工作；另外，又派丁沛生打入一二一师任警卫连长。此后，我同中共安顺县工委通过丁沛生组织了一二一师二个排的武装，拖出队伍到郎岱、盘县一带山区，以中共黔西第七支队名义打游击。同时，又利用一二一师与国民党中央嫡系李觉部队火拼的时机，挤走了李觉，使安顺仍由一二一师驻防，造成客观上对党的活动较为有利的形势。关于两军火拼情况和我党的工作，曾由谢速航写了报道，发表于巴黎由党所主办的《救国时报》和上海《少共真理报》。短短期间，贵阳、安顺等县建立了县委，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织金、赤水、桐梓、仁怀、惠水、贵定、都匀、独山、镇远、炉山（今凯里）、德江、思南等十余县，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在军事工作方面的关系由省工委单线领导，掌握了一些民间武装，在地方部队中的工作也有了一定基础。

革命的力量在发展壮大，反革命势力也加紧伸入贵州。在红军离黔入滇，挥戈北上以后，蒋介石实现了他的挤垮、兼并贵州地方军阀实力的计划，把魔掌直接伸入贵州，建立了法西斯特务统治。中统在贵州的头子，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收罗反动学生伪装进步，混入群众活动之中，充当其耳目，破坏抗日反蒋运动，打击进步力量。当时，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对红军离黔以后反革命势力的反扑估计不足，大规模的群众活动仍在发展。一九三五年五月，在贵阳发动组织纪念“五四”、“五卅”的活动，就引起了敌特机关的注意。接着林青同志的化名通信又被邮检截获，查明了他的笔迹。敌人感到了贵州的革命力量给予他们的威胁，便步步围逼，形势日趋紧张，白色恐怖气氛日愈严重。省工委审势采取措施，布置隐蔽转移，并在党内进行应付突然事变和坚持革命气节的教育。

但是，敌人也加紧行动。同年七月十九日上午，特务闯入

刘茂隆的住所，当即拘捕了他和同住一起的李忠良、郑成思两人，并就地埋伏守捕。不久，党员李策前往，被羁盘问，他机智地利用党曾派他接触过一些反动学生头目，见过一些特务，对其内部人事关系有所了解的有利条件，佯称是中统特务头子派他来此找人的，从容应付，不露破绽，才摆脱危难。在判明没有特务尾随之后，他急速赶到省工委机关（贵阳忠烈街八号），向我汇报告警。我们除立即转移外，并派两位同志赶到出事地点附近的街口，隐匿警戒，防止我们的同志再入罗网。天黑时，被派去警戒的两位同志，见无人再来，一位自行撤回，一位失去警惕，意欲探察虚实，进入出事地点而被捕。林青同志随后由郊外回城，不知情危，径直而往，我们的警戒既失，他亦遭逮捕。这次事件中有七个党员、四个群众被捕。

当时，看守林青和刘茂隆同志的董亮清，曾于一九二九年底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在上海参加过工人暴动。暴动失败后流落到社会上，后被迫到伪中央财政部孔祥熙的税警团当税警。之后，随该团来贵阳，看守监狱。当他得知林、刘被捕原因后，便暗中与他们商议越狱。及至行动之日，因按狱规看守每次只能押送一人上厕所，林青同志决定刘茂隆同志利用这种机会，先随董潜逃。刘、董脱险以后，林青见无动静，也破壁翻墙而出，因刑伤过重，摔倒后被拘回。省工委在刘茂隆脱险后，决定他迅即取道广西梧州，再转赴上海。同时按董亮清的要求，资助他回山东。林青同志在狱中，遭敌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维护党组织和同志的安全，坚持革命气节，同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被判死刑。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国民党反动派在贵阳公开杀害林青同志。敌人惧怕他赴刑场途中宣传革命，揭露黑暗，竟用短刀横勒其口。林青同志含刀沿街艰难地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蒋介石”。

石！”“中国共产党万岁！”刀口由唇角两侧切入面颊，血流满身，仍呼喊不绝，直至英勇就义。沿街目睹的人，暗叹不已。这是反动派在贵州第一次公开杀害共产党员。而林青同志视死如归，忠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七·一九”事件造成了林青同志遇难，贵州革命形势暂时出现低潮。

三

从一九三五年“七·一九”事件发生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日民族救亡运动爆发，贵州地下党实行隐蔽精干，分散活动，重点转向农村，在边界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军事工作。

一九三五年八月，省工委决定邓止戈到毕节组织武装。我先去盘县、郎岱整顿了沛生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后赴上海找党汇报。贵州等地分散隐蔽的党员，我们通过孙师武、高昌华等在广西梧州大学建立的联络点转由徐健生负责联系。遵义、安顺等地基础较好，继续深入农村工作，发展党的组织。黔东南由李光庭在炉山（今凯里）、雷山一带建立了武装力量。

同年十二月，徐健生到毕节与邓止戈向当时在毕节的红二方面军领导同志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情况，就地发起组织贵州抗日救国军，推举当地爱国进步知名人士周素园担任司令，率部参加长征。邓止戈随军北上，徐健生仍留贵州坚持地方工作。

一九三六年四月，我从上海返回梧州联络点，与由贵阳赶到那里的徐健生相会，交谈了情况，先后返回贵州。五月我先回到都匀，给高言志等布置工作。六月在黔桂边界通过原来建立的社会关系毛景周、龚泽霖等，争取了活动在这一带的贵州

抗日救国军的领导权。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是穆守先，毛景周是纵队司令，我（化名余汉生）是政治主任，王石安是秘书主任。经过我和王石安的工作，使这支队伍确定了反蒋、抗日救国的方向，成为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

西安事变发生，我们派人去广州了解国内政治形势，与华南党取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停止“抗日反蒋”的口号，在群众中进行“逼蒋抗日”的宣传教育。一九三七年六月，我再次由黔桂边界取道梧州、香港转赴上海，在那里碰上贵州在上海的一批进步青年。我与刘雪苇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抗日主张，并动员他们回黔开展工作。不久，“七七”事变发生，“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了。我即由上海去西安，在西安办事处向博古（秦邦宪）同志作了汇报，经他决定转送我到了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

一九三七年九月，蒋介石被迫宣布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团结救国的必要。于是，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日的路线，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党的工作仍然处于复杂艰苦的环境。一九三八年二月，中央决定派我和邓止戈回贵州工作。临行，李富春同志指出贵州进步力量比较薄弱，工作还有不少困难。但抗日形势是会影响贵州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形成的情况下，应放手发动群众，改变过去用读书会、文研、社研等组织群众的办法，要利用各种公开的社会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民众运动。同时还指出贵州是后方，与敌后情况不同，不要在蒋管区搞武装游击活动。贵州省工委由我们和先期从延安返回贵阳的黄大陆和原在贵阳的李策同志组成。

同年二月下旬，当我和邓止戈回到贵阳时，黄大陆、李策、严

金甦、王棣等十人，已被国民党贵州绥靖公署诬为“托匪汉奸”加以逮捕，妄图在此罪名下杀害他们，并把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以来，“学联”在贵阳地区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打下去。我们决定组织营救。当时决定由隐蔽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孟昭仁同志，密电向武汉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报告；又以李策同志家属丁毅的名义，公开用明码电报拍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同志报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公开营救，揭露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进一步发动群众。很快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分别致电贵州军政当局，证明黄、李等四人是十八集团军的干部，要求立即释放。国民党反动派口头上答应放人，实则刁难拖延。这时八路军贵阳兵站已经建立，兵站负责人袁超俊又继续交涉督办，但国民党仍拖延不放，黄大陆、李策、严金甦、王棣等四人于狱中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他们被敌人秘密杀害了。

中共贵州省工委在这一时期，根据中央指示，认真分析了贵州形势，弄清了各地党的组织状况，停止了武装活动。党主要是通过和利用社会上公开合法的一些团体和组织进行工作。党员黄奇鑫、任虹、方士新、杨斌毅等在筑光音乐会、沙驼剧社中活动；社会进步知名人士田君亮、梁元东、郭一琴、吴澄华、高振等一批大学教授和作家，在党员何战白等的联系下，出面积极争取建立了中苏友协；刘方岳在党员蒋蔼如等的参加下，组织了社会科学讲座。党还利用红十字会、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俄文补习班、时事讲座等，开展活动。党员王启霖在社会职业掩护下，开展宪政座谈会的活动。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建立，由吴之平、郎德服、陶浩三人负责，工作完成得很好。生活、读新书店建立了党的支部，熊蕴竹任

书记，公开工作很活跃，而党的秘密工作一直没有暴露。这一时期，中共贵阳县委书记先后由谢凡生、陶信镛担任；思南县由肖次瞻、熊大瀛负责；安顺县由谢速航、杨斌毅领导；遵义县由杨天源、湄潭县由陈光型领导；金沙县由李绍夫、兰芸夫领导；镇远县由田伯萍负责领导，各地工作都有较大发展。通过群众活动，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推动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

为了积极培养和输送干部，一九三八年三月，省工委决定派徐健生、周晓山、张震生等同志第一批赴延安学习，介绍他们到当时尚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转送去延安。由徐健生代表省工委向党中央汇报了当时贵州党的工作情况。此后即分批选送党员和革命青年陆续去延安学习。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从武汉派张益珊到贵阳开展民先工作。组织工作、活动方式和内容都由民先武汉总队部直接布置。由于当时贵阳民先领导人同贵州地下党没有接上党的关系，我们只好派出一些党员以群众面目出现参加进去，设法接触其领导人，引导民先工作的正常发展。但民先活动早被敌特注意，企图一网打尽。同年八月，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登报通知，要一切抗日团体登记。民先领导人未能识破敌人的阴谋，希图通过登记，借以争取合法地位和公开活动的权利，遂自行交出民先的部分名单进行了登记，并于八月十三日集合民先队员七十余人，打出民先的旗帜，集队前往国民党省党部指定的贵阳民众教育馆集中。队伍到达后，立即被军警武装包围，中统在贵州的特务头子借口将民先成员集中训练，送到抗日前线，实质是将他们逮捕起来，不让他们活动。民先队员据理批驳抗议，群情激奋，反动派理屈词穷，竟横蛮逮捕了民先领导人和一些成员共三十多人。事情发生前夕，地

下党获悉民先已登记并要游行集会，当即布置派往民先中进行工作的党员黄慧珠进行劝阻，未被民先负责人采纳。事后，地下党才接到张益珊的党的关系，而他已被捕入狱。一九四一年他和另一民先负责人凌毓俊被敌特杀害。其他被捕的民先成员于一九三八年秋全部释放。民先遭到破坏，由于其中党员的身分未公开，没有影响地下党组织。在斗争中一些表现坚强的民先成员，后来经过审查吸收加入了党。

四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发动了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〇年三月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第二次反共高潮即将到来，形势十分危急。党在这种情况下，紧急组织疏散隐蔽，一部分经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先后护送去延安；一部分早在一九四〇年初输送到新四军；一部分转省外隐蔽活动，但暂不转党的组织关系，叫转地不转党；一部分就地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保存了党的力量，防止了敌人的大破坏。一九四〇年四月，中共中央南方局调我去延安。省工委的工作由邓止戈负责。一九四一年春，中共中央南方局曾派张述成来与邓止戈、肖次瞻负责贵州工作。皖南事变后，邓止戈离黔、肖次瞻牺牲，贵州工作由张述成、杜守敦、陈佑平、刘载铭、黄奇鑫等人负责联络、疏散工作。同时，张述成、陶涵春在桂林，陈佑平在重庆，杜守敦在昆明，刘载铭在贵阳，具体负责地下党员的疏散、联络工作。刘载铭同志在贵阳一直坚持斗争到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贵州地下党坚持长期斗争，分散隐蔽各地的党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利用一切可能条件，积极进行工作。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发生，贵州地下党随即处于严重困

难的境地。白色恐怖笼罩全省，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打击进步力量，进步人士和进步青年被威胁、殴打事件不断发生，被捕关押多年的黄大陆、李策、张益珊、凌毓俊等，新近被捕的肖次瞻、陈光型、陈法轼、李绍夫、蓝运臧、王定一、寇叔彭等十多人都先后被杀害。另有极少数人动摇、消沉，甚至有的叛了党。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先后派李晨（化名李振铭）、赖卫民（化名赖映棠）来贵州遵义。李以浙江大学（一九三九年迁来遵义、湄潭）学生身份、赖以尚稽中学校长的身分作掩护，直接领导浙江大学的地下斗争。在地下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师生中开展了革命活动，如：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的倒孔（孔祥熙）运动，师生上街游行；一九四四年底，黔南事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浙江大学教授费巩去重庆北碚复旦大学讲学，在重庆突然“失踪”，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激起了浙江大学师生和全国人民的公愤。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费巩事件”。

在一九四四年初，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新进攻，八个月内从河南打到广西，进逼贵阳。在日军占领独山以前，贵州地下党着重于准备组织武装抗敌，建立了黔东、黔南地区民间武装力量。一九四五年日寇撤出贵州，根据中央指示，原来准备打游击的党员又重新隐蔽。

解放战争后期，一九四八年秋，中共中央华南局一方面派回贵州地下党疏散到川东的党员张立和同时调来的刘谿铸返黔负责。后又派宋治平、张鸣正等人来协助张立工作；一方面陆续派姚国安、安毅夫、梁燕等人来贵阳工作，并由他们三人组成中共贵阳特别支部，直属华南局领导。此外，向国灵、温凯庭

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由四川来黔单线工作。邻省边界处，如川南与黔交界的赤水一带，有廖林生、周生；黔滇边界有龙腾霄、王纲正、龙德霖、段一芳、王秉葵；黔桂边界有黄焕民、熊亮臣等领导的武装力量，组织群众，开展斗争。这段时期，地下党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反美反蒋的民主运动，在蒋介石集中其兵力进攻解放区，他的后方空虚的情况下，组织民变武装牵制蒋介石，呼应解放战争。在武装工作上，黔东北游击纵队，黔北游击队，安顺、紫云、长顺游击纵队，盘北游击大队，盘县游击团，兴义游击团，安龙游击团，威宁游击团都有发展。一九四九年王舍人等组织发动的郎岱暴动，以及其他地方的武装斗争，使蒋介石腹背受敌，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大军南下西进。

在国民党反动派从贵州溃逃前夕，地下党为保护城市，使工厂免遭敌人破坏，发动群众组织了护厂、护校、保卫人民财产的斗争。从抗日战争时长期隐蔽埋伏的党员陈廷维、张震生等，此时积极策动贵阳电厂经理奚长年，晓以大义，组织工人护厂供电；在工人、技术人员积极主动的参与下，实行武装护厂，使企图破坏电厂的反动军队的计划未能得逞，成功地保护了电厂，坚持供电。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时，全城人民张灯街门，一片光明，迎接解放，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嘉奖。

李光庭、李长青等同志在炉山一带，执行党中央隐蔽精干政策，长期埋伏，此时则率所带的武装迎接炉山解放。毕节、威宁、安顺、盘县、遵义、湘潭、赤水、松桃等地区在党的积极争取下，促成了一些国民党部队的武装起义。

国民党反动派愈临近死亡愈疯狂。伪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和驻贵阳的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他们都准备毁灭贵阳。由于我